

第一卷 第十一期

贈閱

這一週

編輯室

論擴大徵實

對於中國目前農業建設

公誠

中幾個問題之商討

藍夢九

論戰費的負擔

呂克難

民主國家的公務員應有的

認識

李宗義

論魏特邁來華

景蘇

論愛國

林學洪

杭州報紙通訊社透視

胡天

•逢星期六出版• •每三千元•



這週

• 民主論 •

印荷戰爭與緬甸暗殺事件

近些日子的印荷戰爭與緬甸暗殺事件，激起了東方民族極度的不安。本來東方就很少有一片樂土，從日本到巴力斯坦，從蒙古到印尼，在地球上這一大塊的土地之內，多數，乃至所有的國家都可算是弱小民族。他們受了帝國主義長期的剝削與壓制，非但生活困苦，精神亦異常頹廢。在這塊弱小民族的集中區，我們處處都可以意識到自卑心理，自我摧殘，無路可走的命運。

他們失掉了自信，看不起自己的一切，寧願給帝國主義作苦工，不然就給蘇聯機器作防衛營壘，射擊目標。他們給人家牽着鼻子送進屠宰場之餘，還每能搬出種種理論來作理性的自況。佔在魔鬼與深淵之間，可惜他們每每不能自覺，亦不能自拔。荷印戰爭是一件可悲的現象，緬甸暗殺事件更是一件可悲的現象。這充分反映出弱小民族的處境，弱小民族不正當，不健全的心理。我們懷疑東方民族到底是有那一天能够恢復獨立自主的尊嚴，獨立自主的自信心。所謂四強之一的中國，似乎應該在這方面作一個榜樣，然後再積極的聯合東方的弱小民族起而爭取各自的獨立自主；擺脫自己的羈絆，進而幫助旁人擺脫他們各自的羈絆；這似乎纔配作一個有歷史的民族的奮鬥目標。

開放日本

麥克阿瑟將軍一手包辦的日本行將開放貿易，聽說在三百名定額之中我分得了六十餘名。消息傳來，

對外貿易 有的人高興，有的人憂慮。高興，因為這又是一個機會，可以操縱把持，再發一度橫財；憂慮，因為當國家實業極度不振的時候，再來一度日本平價貨物的傾銷，則我國現在處境困難的工業必將永無翻身之日。在日本開放貿易之下，我國在南洋一帶的貿易必受重大的打擊；據說自己的羈絆，進而幫助旁人擺脫他們各自的羈絆；這似乎纔配作一個有歷史的民族的奮鬥目標。

魏德邁來 好像「聖誕老人」似的魏德邁將軍終於到了南京，一番歡迎，宴會，應酬，寒暄，想已把今日的首都那裏推測，說的對華貸款預料十月可以成功；說的要中國改革幣制，減少軍隊；說的中樞要調整人事以適應美方建議；……正當此時，一般物價下落，而黃金美鈔尤為顯明；在股票市場，洋股反面走勢，華股則有背道而馳之象。這空氣確是有作用，但日後的事實會證明甚麼？失望？抑一切一切都如願以償？

美國自羅斯福去世，杜魯門總統上台以後，牆街的勢力一天天在抬頭，過去的民主份子逐漸退出了政府。牆街的人們生意眼重於政治，所以儘管他們反蘇反共，賠本生意他們是絕對不顧做的。在他們，借錢給中國當然是沒有不可以的，但是他們不能不考慮這亂紛紛的中國到底有沒有能力還錢。所以即使借，也得附帶若干條件，而這些條件想來一面要包括安定中國經濟，使早晚能還得出錢，一面當然要給予美國若干商業上的優待。至於杜魯門下屆選舉的勝負，乃至美國參議院對政府的種種牽制似乎還是小的問題。

說到這裏，我們想起若干人士有所謂「民主國際」的建議，而希望美國能夠出來領導。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但希望美國出來領導則不免把美國看得太簡單了。美國除了短短的若干時期之外，向來是把持在牆街的人們之手。他們也許是自由份子，然而他們是篤信資本主義的自由份子。等到他們的資本膨脹到相當程度，他們的自由早已侵害到旁人的自由；他們實際早已成為拿破崙主義的信徒！讓這些經濟界的拿破崙出來發起「民主國際」的運動。成功了也是很可怕的！

，總是願意把私人利益擺在國家利益的前面，結果使任何辦法都辦不通，實在值得我們從長考慮，找出一種澈底根治的有效辦法。

論擴大徵實

公誠

行政院的七人小組會議，為配合總動員令，計劃經濟上的重要方案，其中有一項是現在要討論的，那就是擴大徵實的辦法。所謂徵實，事實上不過徵糧，其他實物並不在徵收之列。此次徵糧標的異常鉅大，以四千萬石為度。這樣影響民生的政策，我們實在不容沉默。

第一，我們對於四千萬石這個數字表示懷疑。七人小組於決定這個數字之際，應當不是任意選擇的；但究竟有什麼根據，却又推想不出來。每人的口糧以每月二斗五升計算，則一人每年需米三石；以每月二斗一升計算，則一人每年需米二石五斗二升。因此四千萬石的軍糧，最少可以動員一千三百三十餘萬的軍隊，最多可以動員一千五百八十八萬軍隊。假使把四千萬石作為半年的軍糧，那動員的人數又可增加一倍。作戰的士兵，固然很多，但沒有前面所說的數字那樣驚人，這又是很明顯的。那為什麼七人小組要決定四千萬石這個數字呢？亦許把公教人員的公糧也包括進去了，不過大部分的公務人員祇領差額貨金，實際領米的不多。因此之故，四千萬石這個數字，我們有一點疑心是想像中的估計，而並不是真實需要的數額。

其次，我們要討論這樣巨額的米糧是否應該用徵實的方法集中？徵實的辦法，從政府來看，亦許是最直捷了當的，但從財政的原則來說，則手續的繁瑣，時間的拉長，常常會增加納稅人的損失。自從實行徵糧的政策以後，莫不認為這是臨時的辦法，一有替代的方法，立刻應該中止。現在還加以擴大，除增加人民的失望以外，還能有什麼？

糧政的弊病，所有的人類能道其一二。米的徵收，比法幣徵收要困難多了，因此用人不得不增加，設備不得不增加，雖不至得不償失的程度，但無形中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擔，那是確定不移的事實。由糧管理處是政府中最大的機構，普通總是在一百人上下；而各處還要建立倉庫，設保管倉庫的人，種種費用，想像不到的浩大。而且徵收的手續一麻煩，舞弊的

機會也特別多。秤頭上做手腳，折額上做手腳，毛病不一而足；大秤秤進來，小秤秤出去，完全是徵收處的好處。徵收的時候是二〇七斤穀作米一石，解貨的時候是二〇二斤穀作米一石，憑空中來了加功盈餘，這有的割作地方政府的正當收入，有時亦完全是中間人的好處。其餘如收的是浮穀，解的是霉穀爛穀；倉庫中儲藏的時候要有損耗，路上運輸的時候要有損耗；總之，一路的七折八扣，到政府真正收到的時候已經打了對折，甚至還不滿對折。不但如此，徵實還時常增加人民的義務役。糧食的集中，政府雖然出了些賸價的工價，而執行者因為數目過小，索性徵調民役當差，而運糧的時節，又往往是農忙的時節。

上節所列舉的糧政弊病，猶其肇大者而已。因此之故，政府若規定徵實的標的是四千萬石，那人民的負擔實際上是八千萬石。這可以說是異常浪費的一種賦稅了。

亦許有人說四千萬石的徵實不能算太大，因為每人平均的負擔還不到一斗，即使加上徵實過程中的舞弊和耗損，每人平均的負擔也不會超過二斗，這也不能說太苛猛？但是我們的負擔事實上並不是平均分擔的。米糧的徵實，除自耕農與地主外，其餘的均置身局外。徵實是不能轉嫁的，農民既無法抬高糧價，地主亦無法增加地租，因此徵實的數額，要完全全的落在兩者的肩上。然而自耕農和地主的納稅能力究竟如何呢？按理說，自耕農與地主是農民中納稅能力最強的人，但抗戰以來，他們竟是逐漸在走向破產過程之中。一方面因為收入的銳減，一方面因為支出的擴大，遂有不能支持而要典賣度日的趨勢。而所謂支出的擴大，那完全是因為徵實的緣故。在抗戰以前，每畝納稅不過一元，折合當時的米不過一斗，現在徵實，一畝則納糧穀三十五斤，幾乎漲了一倍。徵實之外，還要加其他種類繁多的捐項，當然要有不能支持的現象。許多人亦許認為自耕農和地主的沒落並不足惜，因為農村經濟的破產，說不定就是工業經濟的

產生，而且使不勞而獲的人多負一點責任，在公道的原則上亦說的過去。

這兩項理由，個人認為均有商榷的餘地。農村的衰落，可能成為工業經濟繁榮的因素，但又不一定可以使工業經濟誕生。現在的所謂自耕農和地主，資力並不雄厚，即使說他們被迫的轉變投資方向，但也不能增加多少工業資本。而且現在的中國經濟社會，剩餘資本均集中於投機市場，因為祇有還可以保持資本的有益利潤，因之農村的資本就是很多，轉變投資方向的結果，祇有更擾亂金融市場，而並不會增加工業資本的生產率。從事實方面來剖析，農村經濟已到了不能支持的程度，不能算是享福的不勞而獲者，更增加他們的艱難，祇有增加社會的失業者，祇有增加社會的不安。

那兩個重稅自耕農和地主的理由竟可以說是不能成立的。

從財政的原則，從公平的觀點，從經濟的理由，徵實都不能說是好的辦法。薄賦輕稅，原本是無為政治之下的德政，近代國家實難於希冀堯禹時代的簡樸，我們要求於國家者既多，則國家取之於人民者自然亦多，我們不能苛刻地希望政府免掉一切的賦役。但是賦役可重，而賦役必須求其平均分配，必須求其不影響一般人的生活能力。我們既然要求國家建設這個建設那個，我們就沒有理由反對政府為建設而徵收租稅。可是政府若不把租稅平均分配於人人，如何能做到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的原則？向有能力者徵稅，這是自來財政上一定不易的法則，今則一反其道，專向不能逃稅者徵稅，趨勢所及，幾將把所有的負擔集中於一種人的身上。久而久之，這種人自然要變成熟陀而倒在地上了。這樣的徵稅，國家的財源既然很容易枯竭，而忠厚老誠國家恃以為基礎者又很容易在這種政策之下遭宰割。至於虎的苛政，就是指這種不智的政策。

徵實不是妥當的辦法，徵購是否較為合理呢？我們亦認為未必。徵購必須集中如故，各處之必須有倉庫如故，政府之必須任用大批人員去管理糧食亦如故。而在這種種的轉折中，一定還是照樣的人民遭殃而政府受耗損，貽害亦復不少。徵購我們也實施過的，結果是政府所付的代價存留在縣長鄉長保甲長的腰包裏，農民並未得到一文。所以從政府來說，徵購還不如徵實，而從農民來說，兩者完全是一樣的。

然則徵實徵購皆不能行，軍糧和公糧從什麼地方來呢？我們因為徵實徵購有弊病而不要軍糧公糧，這不是真的因噎廢食麼？我們當然不是作這樣的看法。我們認為軍糧與公糧的出處，不必盡在本國。我們產糧不足，雖無正確的統計，但在各種估計中，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我們既然有一部分糧食要仰賴外國的輸入，為什麼不把輸入的那一份作為軍糧與公糧？因為這樣，既可省手續，又可免除舞弊。米糧一進海口，立刻可以解饑兵站，鄉保長冉亦無法染指了，糧吏再亦無法做手脚以爛穀去換浮穀了，不是這一重中間的鉗制可以避免了麼？而建立倉庫的費用，轉運駕馳的痛苦，也可以完全省掉。不此之求，而一定要徵實徵購，我們就不知理由安在了。

士兵的糧食大米與麵粉孰重，我們並不知道。但在想像之中，士兵應該需用麵食更多。而本國的糧食，米多於麥，產麥的區域，都是自給尚虞不足之地，為軍食而徵實，產麥區域所負的重量更多，而國外輸入的糧食，可以麵多於米，與軍食的需要適相符合，軍食完全依賴輸入，這也是比較方便的理由。停止徵實徵購，並不至於軍糧一無着落，相反的，停止徵實徵糧以後，也許我們可以得到更便宜的軍糧與公糧。為着一般農民的生活，為着減少劣吏舞弊的機會，為着軍隊得到比較好的食糧，我們要求政府對擴大徵實的辦法再作考慮。民食維艱，民命堪虞，政府不應該熟視無覩的。

對於中國目前農業建設中幾個問題之商討

藍夢九

目前中國農業建設中的問題甚多，舉其重要者言之，約為（一）農業建設與農業教育分離；（二）農林部應辦之事項被他部分去；（三）農業推廣不到農村；（四）各種農業研究工作，缺乏配合，不切實際；（五）

農學界內部有門戶之見。有以上各種困難，故農業建設，效果殊鮮。窮不揣冒昧，欲將管見所及，提供意見，以謀解決，尚希讀者加以指正為。

各種專門人才，與教育部培植人才之計劃，各不相謀，不能符合；而農部推廣工作，教育又不能與之配合，給其幫助也。農林部為謀建設合作，似應設置一全國性的農業設計委員會，除以部內各技術單位主管人為當然委員外，並加聘國內各大學農學院院長及若干教授為委員，共同商討農業政策及施政綱領等，此猶為治標辦法。至於根本辦法可使教育部辦普通大學，專注重普通學理，農林部兼辦農業教育，而與實驗研究推廣等工作合併為一體，專注重技術訓練。具體言之，即由中央農、林、牧、經、水產等各實驗所合併成中央農業研究院，各省農業改進所，各省農學院與各省農業推廣機構合併成為各省農業院，各縣農業推廣所兼辦縣農職校農訓班，縣農事試驗場，及示範農田等，並普遍組織訓練農民，以促進整個鄉村之建設。如此，建教合一，農業建設自可按日而收大效。

(二)離去水利、土地、資本、勞力中任何一種，皆無法言農業生產，更無從言農業改良，此盡人而知者。我國今日之農林部行政，凡上述各種農業生產條件，悉被其他部門分去掌管，更將農業運輸上之鄉村道路河流，農產儲售上之市場管理等，亦分讓於其他有關部門。如其他部門不與農林部謀合作，則農林部將一籌莫展，無事可辦。在英美社會，一切機構，分工愈細，則合作愈密，反觀我國，則分工愈細，牽制愈多。故目前農林部所能完全掌管者，僅農業實驗與農業推廣二事而已。但農業推廣有賴於鄉村教育與之配合，如學校不為助，則推廣事宜將寸步難行。而實驗有賴於推廣工作與之配合，如無推廣工作，則實驗室工作與農人田間工作，根本脫離，各做各的。因此，農林部所掌管之實驗與推廣工作，亦不能順利進行。補救辦法，目前只有與有關各部謀密切之合作與連繫，但用何種方法始能謀得密切之合作與連繫，尚須作進一步之研究。而根本辦法，則惟有將各部職權，重新劃分，使農林部對於農業改良工作所必備之條件，在行政上能歸於完整，庶幾可以言農業建設也。

(三)我國採用外國之農業科學方法，以及自己研究改良所擬定之新方法，所以難於廣行於農村田畠中者，根本原因在缺乏基層農業推廣組織。農林部歷年來對於推廣工作之努力，儘在上中層機構之擴充，而欲樹立之，事實上相隔甚遠。照現在作法，今後縱以更多數十倍之人才與經費，完成寶塔式的推廣組織，而由中央逐步經過五層行政手續，以達於鄉，費時既久，時效已失。再以上層人才學識經驗多，待遇高，意向下層而意低，及至縣鄉層推廣機構之工作人員，其經驗學識尚不如老農，為能指導農人，為其解決問題？故表面上的機構雖然自成體系，實際上則不免徒耗人財經費也。補救辦法，似應以全力幫助各縣，充實各縣農業推廣所，不但於每縣設置農業示範場，科學陳列館，農職校及農訓班等，並且提高縣鄉工作人員之資歷與待遇，獎勵高級專門人才，甚至相當於大學教授資歷與待遇者，攜帶上級機關原薪，到縣鄉服務，仿照英美直接與農民接觸之農業推廣機構工作辦法。至於私營之現代化農場，可為民間表證者，則委託其代行推廣事宜，農民必更樂於聽從仿效。又省縣農業機關應充分與農民合作，辦理合作表證農田等。

(四)我國農業研究，缺乏組織，全國各農業試驗研究機關，彼此各不相謀，亦從無一政府機構為之調協謀取合作。而各種農業學術自由團體，亦彼此意見分歧，從不討論此事，縱論亦屬無益。農林部有一常務次長，更有一技監，似乎應該有此責任，但或以部內事務太忙，不暇過問；或以自己學識太差，不敢過問；或以完全外行不諳農業學術為何物者，不知如何過問。以至今日，農林部雖只剩得掌管農業實驗研究與農業推廣二事，實際上連對於自己附屬的實驗研究機關，都不會過問，遑言其他。至於農林部的農業推廣工作，事實上亦僅幫助農民銀行介紹貸款而已。無怪外邊的人不知道農林部辦些什麼事，就是農林部內的人，恐怕許多也不知道農林部應該辦些什麼事。這是就全國的農業研究機關沒有組織，沒有配合而言。再就一個研究機關內之各部份言，亦往往各行其是，不互相商討，幫助，向著共同目的去努力。甲說甲的重要，乙說乙的重要，其中巧於言辭而能力爭者，及與主管人素有交情者，可以處處佔便宜，或多分經費，擴充設備。反之則雖屬重要，亦將被放在次要，或不重要，甚而被他人兼而併之。今日中國農業建設各端，到底孰是首要，孰是次要，應該研究的到底是些什麼問題，誰都不能說，不願說，亦很難憑空臆測。故只好各說各的重要，而認為現在研究的就是應該研究的，有誰能講一句批評的話？

一個出問技術問題之研究與解決，應該按其性質和各種關係因子分為若干小問題，由各有關實驗室去分別研究試驗，必俟共同解決此問題而後已。

像英國美國的農事研究實驗機關處理問題，都是這樣。這還是就內環的連繫言，還有外環的連繫，就是須要其他非農業研究機關來幫助農業機關解決問題的組織。目前我國農業研究工作，極其缺乏此種組織。每每問題之研究，各專家各自選擇一個自己有興趣的小題目，仍如會在外國要求學位作論文那樣做，與實際農人需要解決的田間問題，往往隔得很遠。而努力研究者又因缺乏組織的研究，無合作互助的其他研究員，很容易遇到有關其本問題之其他問題不能解決，而發生研究上之困難與停頓，不能求得原問題之解決。以上各種研究組織上的缺點，亟須補救，亦很容易補救。

(五)中國目前各處都有門戶之見，以致是非顛倒，人材埋沒，農學界也不能例外。留學回國的依國別而自成學派，在國內各大學畢業的也依學校而自成學派，再加上黨派關係，和地域封建等關係，弄得來人事非常複雜。每到一處，只聽說某某在佈置黨羽，把持機關，排除異己，互相傾軋。過去尚有人認為不應該，現在幾乎都認為是應該的了，因為生存競爭，強權公理，不得不然。所以在許多地方壞人容易出頭得勢。近年來國家

損失的人才，實在太多了。至於機關被某些人把持後，猶如商場已經得到

壟斷，遂不求貨品改良，而只一味加價，此時被把持操縱的機關，遂一味苟且敷衍，甚至貪污作弊。我國現有農業人才，約一萬五千人，目前只有五千人在農業機關服務，其餘一萬人都被把持操縱，排除異己者據拒於農業服務機關之外，迫其改業，殊為可惜可慨！如能本人盡其才之訓，與用人惟賢之旨，早使此被排斥改業之農業專才各得其所，積極的至少可以比現在增多或加速二倍以上之建設，消極的亦可充分減少現在的把持敷衍等積弊。如門戶之見不能除去，甚至今後因黨派關係更複雜更動盪，同時證書考試銓叙等對黨派以外的人，都無保障，人事不公開，考績不公平，則機關用人，只好根據各黨派來比例分配，如像選舉代表來參政那樣，或許還可以得到普遍的人才，不失為公平用人的補救辦法。其次可仿大學各院系的辦法，讓技術單位主持人，自由物色其相知能和諸者，分頭發展其事業，主管人只將所屬各單位的主持人公平分配於各黨派，以保持其平衡，令其互相比賽，考其工作成績之優劣，則劣者雖被整個淘汰而無怨言，他人亦無從庇護。如此，不但事業可以迅速推進，人才亦將倍出矣。

論戰費的負擔

呂克難

三個月解決共軍武力」的豪語，後來大概是事實修正了當局的判斷，說是要六個月。半年很快過去，全面總動員令下以來，基于東北戰後及山東失利的教訓，當局發言已大為謹慎，不敢再奢言何時結束，然而一貫的信心不變：國軍必可剿滅共軍。反之政府的對手却也不甘示弱，有一個時候話言孔多，特別是經濟風潮前後，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共黨乃發出「和平協商」的要求必然佔多數。何如這是一種奢望，理想與實際原是隔有一道鴻溝的。對此，我們只有深深浩嘆！

打仗打定了，國共已註定要在戰場爭勝負。前幾個月，我們曾聽說「

總動員令頒佈之後，國共是打定了。從此國內和平的幻想一掃而空。現在再來談內戰的責任問題，不但是迂緩而不切實際，並且徒然浪費紙張，與現實之改造毫無裨益。

我個人對現行的內戰素表憤慨，相信極大多數的國人對此當無好感。國中社會教育落後，人民智識水準不够，憑心而論的確離民主政治之途尚遠。但假如事實上有這種可能：舉辦全國性民意投票，我深信「停止內戰和平協商」的要求必然佔多數。何如這是一種奢望，理想與實際原是隔有一道鴻溝的。對此，我們只有深深浩嘆！

打仗打定了，國共已註定要在戰場爭勝負。前幾個月，我們曾聽說「

就信心而言，國共的作風是相同的，一貫的共黨相信終有一天可以拖垮政府。

人民是註定倒臺的。何時結束內戰，只有天知道。軍事和其他因素的平衡一日存在，打垮和拖垮之論，實際上祇有宣傳的意義。

我先聲明：現行的國共雙方，我都反對。國民黨三民主義與實際施政根本是二回事，不然民生主義下的中國絕不是共產黨橫行的天下；反之共產黨的胡幹作風，標榜民主而趨近獨裁，（雖然冠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美名）否則成千成萬的人民不致整批出亡。但這又是理論，事實上前者是當權黨，後者是實力集團，你能苦口婆心勸他們化干戈為玉帛嗎？不可能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已非說是非或勸駁的問題，而是如何打下去的問題，打誠然打不出民主來，而且打的結果很可能連民主的字眼也變成灰燼。但不問如何，打是一個不折不扣不可避免的事實，對於這事實，人民唯有以鐵石心腸來忍受。

這里我不談解放區的人民如何支持戰爭，反正一個自謂的革命黨什麼都可做，作為一個被革命者，義務便是權利，所謂「逆來順受」，解放區人民的苦痛是註定要挨下去了！我們生活在江南，感謝政府的寬大，我們尚可一吐胸中的積鬱。我想戰爭既然要繼續堅持下去，那末如何支持這不能預期的戰爭，應該早為當局所考慮到了吧。

如所週知，戰事持續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應付龐大軍費的問題。現在政府每月的軍費開支，其確數無人知曉，反正總是一個天文數字。軍費的籌措其道雖多，如田賦徵貢，（用以解決軍糧問題），如關、統、鹽、直接稅及公債等（用以解決軍餉問題）。但在入不敷出的情形下，這些稅收無非徒然增加人民的負擔，公教人員貧困如故，特別是軍人以其貢獻自由犧牲生命的代價，其待遇却遠遜於工商各界，即比文職人員尚且不如。這何其不平的怪象，政府非不知，報載白部長的談話，明白指出了軍人待遇的低劣。不過此乃事實問題，政府確是力不從心。誰不知道，國民黨的基本建立在武力上，除非國民黨該倒，沒有一個國民黨員會反對提高軍人待遇。觀乎歷屆國民黨全會的宣言，聽聽每次國民參政會提高公務及軍事人員待遇的呼聲，我們可以知道當局確實寫此明題勞心煩神。

好事者或不允聞：國民黨是當權黨，他要提高國軍待遇，通過一個議

案不就成了？何如問題不會如此簡單，龐大的軍費稍一增加就是天文數字，試問錢從那裏來？若果可以一貫地乞鑿于印刷機，我相信政府內也有的是經濟專家，這經濟的慢性白癡政策，當局不會不知其利害的。老實說，法幣再膨脹下去，遲早要變成馬克和綠背紙幣，再深入一層說，不斷發行通貨的結果，是巨量的貶值，其損失及於每一個法幣持有人，不啻是一種變相的人頭稅，而且我相信政府不會不知現在的豪門資本和既得利益集團，他們之間的交易已非以法幣為籌碼，而以黃金美鈔為媒介的工具，因此法幣貶值對他們毫無影響。不僅此也，他們更可利用法幣不斷貶值，物價高漲的機會，從事囤積居奇進而壟斷市場的反國民經濟行為。所以增發通貨，表面好像與政府無損，實際通貨一增，物價必高，政府預算必為超出，於是財政收入更難平衡，勢必再增發通貨，如此循環不易，經濟崩潰不會太遠的。故為政府計，印刷機確非善策。

今天，財政收支的平衡確已萬分嚴重。戰爭要打下去，問題只有愈來愈尖銳。政府的目的是要粉碎共黨的武力，此期間自然愈短愈佳。要打敗共軍武力，第一必需重振國軍的士氣，第二必需穩定當前的經濟和社會人心；欲達到前者，提高軍人待遇乃必然之舉，不如此不足以平人心而振軍心；欲完成後者，我認為政府必須痛下決心，澈底徵收豪門資本的財產，凍結存放美國的資金而運用之，同時調查全國（目前只從在長江以南地區先辦）超過一百畝以上的土地，發行土地債券，售與耕種的農民，並以十五年為償付期限，在此期間地主的損失，僅由政府先行付給十分之一的補償費，其餘迨十五年後農民繳納是項費用時補償之。

我這個辦法自然只是一個原則，詳細辦法當迨之經濟專家。本文的中心任務是要說明為什麼要採取這個辦法。

理由明顯而實在，我們只要問今天國共鬥爭的錯的何在？一貫以蔽之，國民黨要保持舊秩序，好聽點說要實行三民主義，反之共產黨要創造新秩序，也就是要實行共產主義。換言之，共產黨革命的對象是地主，是資本家，是權貴資本，是買辦階級；中國是一個貧困的國家，這些人畢竟少數中的少數，對於極大多數的貧困者，我相信已無產可共，而且僅存一息，實在也無命可革，這些話絕非為共產黨作義務宣傳，乃是共產黨的本質。我並不如何同情共產黨，對共產黨的反民主作風，且一向表示反對。但從經濟

民主國家的公務員應有的認識

李宗義

時代的巨輪，不斷的前進，民主的狂潮，衝進了我們古老的國家，我們勇敢地迎着這個新的時代，熱誠底接受了這個新的理想。實現民主政治的憲法，已經頒佈了，距離行憲的日期，已不算過遠。人民的歡快，各黨派的活躍，以及政府當局對於行憲的積極準備，都是顯出一種澎湃的朝氣，暗示我們國家的前途，將有一個新生。

任何一個理想，要求它澈底實現，是需要相當時間的。任何一個制度

之觀點論，政府的剿共政策，實際上僅僅對有產者有利，對於廣大的無產者羣，內戰帶來的高物價，無疑是生存的極大威脅。換言之，這個仗是為豪門資本和既得利益集團打的，明白地說，這個仗勝利是保全了豪門資本的利益，這個仗失敗是革掉他們的利益，乾脆而明白的結論，它與大多數人民無關。它不是民族抗戰，其利害得失關係整個民族的存亡，乃是一個二黨私利的內戰，其戰敗僅涉及交戰的雙方。在民族抗戰下，出錢出力也不容辭，身為黃帝子孫人人有此義務，但在目前的內戰下，如前所述，只是少數人的問題，天經地義，為少數人打仗，其戰費當然少數人負擔。進一步論，今天的豪門資本和既得利益集團，大多官商勾結，稅徵不到他們，徵不到他們，壯丁更抽不到他們。現代社會斷無如此不平的現象，明明是為保全豪門資本和地主而打的戰爭，而戰爭的一切消耗和犧牲，竟輪不到他們的身上。他們還有良心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哩！

反過來說，假如今天的暴發戶和權貴資本，依然麻木不仁，依然堅持一毛不拔的守財奴精神。我敢說這個仗遲早要打不下去。因為上述的淺鮮的道理，沒有一個人不明白的。社會人心不平，這個社會就無法安定，豪門資本不自動犧牲，眼前經濟決無辦法，物價高漲，生活艱難，不但是公

教人員和軍人活不下去，財政收入更難期其平衡，其結果是整個社會問題的總爆發。到那時共黨的第五縱隊可以兵不血刃而擄奪整個社會的實權，果如此，豪門資本家除非逃之夭夭或遠涉重洋，否則準上斷頭台。所以結果只有一個，豪富的資本家如果不拿出你所有，那就縱可挨過一時，日久還是保不了險，聰明的權貴們，你們還是吃請酒抑是吃罰酒呢？

為政府計，土地價率辦法普遍實行後，不但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的原

則可見諸兌現，且必可提高農民的生產力，從而增加農產，解決軍糧問題，更重要的是相對的取消了共黨「土地革命」的口號，（注意：這口號是中共號召農民參加革命的動力）無形中削弱共黨的革命勢力，同時澈底徵收豪門資本資產後，不但財政可望平衡，軍費可籌，且大可正人心而奮士氣，相對的也減削共黨另一口號的力量：打倒資本家。

時間不能再拖下去，為保持豪門資本而打的戰爭，為延續地主生命而打的戰爭，天經地義，戰費應該由他們負擔，他們不負擔，這戰爭總有一天打不下去，到那時他們不但要負擔錢，更不幸要拿出性命哩！

醒了吧！我們的有錢人。

，希望它健全，也不是一蹴可幾。我常常這樣想，建立一個新的制度是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如果某一方面的條件，不够成熟，這個制度，很容易變質，也許走入歧途。我以為民主政治能否澈底實現，並不是完全靠一部成文憲法，而是靠全體國民有沒有民主的信心，公民的道德，與實行民主政治的智慧與技術。西洋有一個政治學者曾說過：「民主政治是一種最需要道德智慧與技術的政治」。這句話很簡單，確是不可否認的真理。我今天不預備將民主政治所應具的各項條件，作廣泛的探討，我僅就民主國家的公務員，應該具有什麼新的認識，在政治上居於何種地位，略抒所見，希

望全國公務員，在這個新的民主時代，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與新的轉變，以配合民主政治的建立，與政黨政治的實施。

二

民主國家的公務員，與君主時代的官僚，截然不同。過去的官僚，是帝王的家奴，專為一家一姓搜括財富，鎮壓人民，以維持帝王的權位；巧言令色，卑躬屈膝，以博得主子的歡心。他們憑藉自身的權位，剝削民眾，養公肥己。人民的一切生命、財產、自由、幸福，都操在官僚手裏。他們是人民的主人，站在人民的頭頂上，作威作福，為所欲為。可是民主國家的公務員，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僕。他們所圖謀的，不是一家一姓的利益與幸福，而是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利益，與整個社會的幸福。他們必須尊重人民的意旨，服從政府的命令，公忠盡職，以實施管、教、養、衛的政治，他們不是卑躬屈膝，趨炎附勢，為某一個人做事；而是竭智盡忠，為千萬人服務。他們不是養尊處優的特殊階級，而是奉公守法的模範公民。

民主國家的公務員，與一黨專政時代的公務員又截然不同。過去納粹的德國，及現在共產的蘇聯，都是一黨專政制度。執行國務的官吏，必須為忠實黨徒。國家的官吏，變為一黨的爪牙與御用的工具，政府的官職為一黨所私有，國家的名器為一黨所濫用，政府的公務已變成一黨的私務。公務員，是政府的雇員，他們既不屬於一家一姓，也不屬於一黨一派，而是屬於整個國家的；民主國家的軍隊固應該國家化，民主國家的公務員也必須國家化。他們要為整個國家利益而工作，為全國各階層人民而服務，既不能偏袒，又不能自私。保持其地位的超然與中立。

三

民主國家的公務員，既非一家一姓的奴才，也不是一黨一派的工具。
他们是人民的公僕，政府的雇員，政府的改組，政務官可隨政黨成敗而進退，但全國事務官，應受文官制度的保障，堅守自己的職位，不隨政黨而進退，更不隨長官而去留。過去「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惡習，在民主時代

是不能存在的。事務官為永久終身職，站在事務官的地位，服從執政黨的指揮與監督，以實行政府的政策。各項政治活動，如競選議員，競選宣傳，及替政黨募捐等，凡屬事務官，一概不得直接參加，以免陷入政治的漩渦，而走入分讎制度的錯路。

民主國家事務官，要絕對保持中立地位與客觀精神。儘管在政治上各有不同的信仰與主張，但須絕對服從政務官的指揮與命令。向政務官貢獻意見時，或代為策劃時，須完全犧牲自己的意見與立場，以公正客觀的態度，為執政黨忠心服務，此種超然的地位與中立的態度為民主時代公務員的特徵。政黨政治能否順利推行，亦必以此為標準。

任何政黨獲得大多數人民擁護時，即可當朝執政，但對永樂化的公務員，絕不能藉故撤換，更不得以國家名器，酬答黨羽，安置私人。此種超然的文官制度是民主政治成功的要訣，如果這種文官制度不能建立，民主政治必走入分讎制度的途徑。它所給予人民的痛苦甚至比極權國家還要厲害。

四

民主國家的政治，是一種政治家與專家合作的政治。每個執政黨能否實現他們的政策與計劃，不是靠他們書面的宣傳與口頭的演說，而是靠整千整萬的公務員，腳踏實地，運用他們各種專家的技術，來實行預定計劃，以達成政府的任務與民衆的需要。一個執政黨，能否得到人民的擁護，不僅是政綱政策，要適合大多數人民的要求，最基本的，還要有政綱政策，是否能澈底實現，確有成效。決定政綱政策的人，是通才，是政務官——我希望他們都是政治家——，實行政綱政策的人，是專才，是事務官——我希望他們都是行政家。因此，我們可以認清民主國家的公務員，不是因循敷衍的官僚，也不是舞文弄墨的書吏，而是各有專長的技術人員，他們應該以專家的地位，協助政務官推行政策，以達成政府的任務，滿足人民的需要。他們應該有尊心與獨立性。他們不需要任何黨派，做他們的背景，更無須依附任何私人，做他們的衣食父母。憑着自己的技術與努力，為人民的公僕。他們應該享受合理的生活，與人民的尊嚴，負責任，守紀律，享有永久的職位。「五日京兆」的恐懼，與奔走饑餐的絕命，在

民主時代，固不復存在，而政風的轉變，與更治的的澄清，也可迎刃而解。

五

歐美先進國家的公務員，無論是民主國家的英美，或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他們的政治制度，雖各不同，但國家的官員，確受人民一致的推崇與敬愛。而且認為官位愈高，責任愈重，能力愈強，貢獻愈大。可惜中國社會的輿論，恰恰相反。竟認為做官的無不貪，做吏的無不污，「貪官汚

論 魏 特 邁 來 華

景 蘇

最近魏特邁將軍代表杜羅門總統訪問中韓，自然又是國際中可以大書特書的事件。抱奢望的認為這是反共十字軍的一幕，魏特邁所攜帶的錦囊妙計，將為肅清中國基地的有力方策。最低限度，他會覓取放鬆山姆大叔錢袋的途徑，使我們更可安心於動員令的執行。誠如費存通所云：我們喜歡以人來代表政策，認為史徒威是容共的，馬歇爾是協商的，而魏特邁是反共的。所以魏特邁將軍的再度來華，即無異說明美國對遠東的政策已自消極而變成積極，已由灰色而變成明朗。這一種看法，不僅容易招致失望

，而且事實上要引我們到泥潭中去。任何國家的政策，不能由一想情願的看法 *Wishful Thinking* 來決定，這太危險了，危險的比盲人騎瞎馬還要可怕。

何永信氏也曾警告過這一點。他從美國的政治組織，說明美國在此時欲發動一領導世界的運動，事實上不容易有一個決策產生。馬歇爾計劃，杜羅門主義，在議會中都不容易變成有效的法案。美國政治的制衡原則，會使白宮的主人束手無策。何氏的看法過於機械一些，不得國會合作的威廉遜總統，一樣可以領導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杜羅門總統之所以還不能高唱杜羅門主義，倒不完全因為國會的拘朶，而因為受現實政治的限制。時機成熟，杜羅門一樣可以用一種英雄的姿態來號召美國人，不過現

在，他祇能對莫洛托夫甘拜下風而已。

「已成為口頭禪。中國的公務員既被認為如此卑污，所以一般潔身自好之士，多躲避政治，或為生活的壓迫，改官為商，或竟認為政治生涯，為罪惡的淵藪。這種卑視政治的心理，的確是民主政治的障礙。抗戰期間及復員以後，公務員的待遇非常菲薄，上不足以仰侍父母，下不足以培養妻子，因生活不能安定，行政效率，無法提高，而工作志趣日趨消沈，這實在是一個極危險的現象。我們希望實行民主政治，更希望在民主政治下的公務員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合理的生活，與努力的途徑。」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過了兩年，說大家已準備了血與肉來衝殺，那是不很可能的。但是說大家已經肯死心塌地的走向和平之門，那又未必。一顆炸彈埋在地下，而所謂政治家又辛勤的把它挖掘出來，爆炸是必然的，不過時間問題，却沒有方法推測。蘇聯似乎想利用這個時機，在人家還無法下手之時，來個迅雷不及掩耳的向外擴張，抗議也好，警告也好，反正還不是真刀真槍，落得衝枚疾走來個偷襲。蘇聯這樣的利用時機，也許要縮短那個推測中的時間，但是說現在已到了山雨欲來的程度，那又未免過於驚惶失態了。

在四年以前，有個英國朋友到中國，我們在山城中狂談起世界的命運來。他說：戰時的英國政府較人民守舊，而美國則人民較政府守舊，所以戰爭結束以後，兩國的政治都要有很大的變動。到人民有決定力量的時候，英國會較戰時進步一些，而美國則一定較戰時守舊一些。不過將來決定世界政治的是蘇聯，蘇聯若過分向歐陸深入，英國祇有希望美國做她的支柱。這位朋友是生物化學界著名的學者，而他對世界政治的預測却這樣的有靈驗。我們現在援引他的言論，說明杜羅門的一切，實為美國人民領導美國政治以後必取的途徑。即使羅斯福總統不死，他的舉措也會大同小異。

的。美國國會當然有拾遺的力量，但它所施於總統的壓力，却是要杜羅門更為杜羅門一些。杜羅門之所以還沒有走向極端，實在是美國急於需要清理幾個戰後問題的緣故。戰爭所賜與每個國家的是傷痕與創痍，喘口氣總是要的。在這種時候有人向她挑戰，她也祇有在外交上求招架之功了。實際上就是蘇聯，究竟也僅僅挑戰而已，在這個時候她也不肯真正動員四百萬大軍的。

因此我們想起了歷史的循環，第一次大戰之後，第二次大戰好像一觸即發。然而裁軍縮軍鬧個不了，戰爭的發動到底延長了二十年。就是希德勒登了台，慕尼黑會議仍可拖住了戰神的手腳。人類永遠在毀滅中求永生，所以毀滅也不是說來就來的。基於這項理由，說魏特邁之東來，一定攜帶了美國強硬的政策，那是不可信的。美國對於中國的估價，並不很高，一般人都是這樣說的。麥克阿瑟對於戰敗日本的盡量庇翼，即因對於中國表示失望之故。復興一個戰敗的日本，比復興一個戰勝的中國容易得多！麥帥之敢於袒護東京，我們相信不是出於麥氏一人的私好，而是出之於美國的決策。假使戰勝的中國能成材一些，日本決不至於這樣被驕寵的。有人說美國是純粹的商業國家，祇知道投資的利潤而不知道以政策領導世界，他們的論點未免過於錯誤了。從商業的立場，美國扶助日本是自己害自己，因為兩方面的利益有其基本的矛盾。可是美國到底要扶持日本，因為日本已表示她是在遠東節制蘇聯的重要力量。

美國在避免戰爭的前提之外，必須時時提防蘇聯，那是沒有疑問的。尤其蘇聯侵食東歐以及中歐以後，這個態度更為顯著。但是也不如華萊士所云：祇要舉起反共的旗幟就可以向白宮邀功的。美國對於政治投資，自然也要做一個加與減的計算。在中國，她總覺得這方面的成本太大了，剩餘物資之不足，還要貸款，貸款之不足，沒有一個人可以估計得出中國的需究竟有多少。祇要你放鬆口袋，錢就會像水一樣流到最低窪的地方。而且金錢大量流去以後，不過增加了一些官僚資本，其餘的一切不變。因此，在中國的政治投資就像石沉大海，不能有還本的希望。也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即使表示有反共的重大決心，美國以後的貸款或是接濟總是姍姍來遲的。

魏特邁將軍是中國的好友，但是他的認識，不至於與一般美國人的相

反。要一個美國人而有非美國的想法，那原本是不合理的。在中國，私人的交誼可以影響或甚至改變國家的政策，但這不能求之於其他國家的人士。魏特邁將軍所做的，尤其那許多可以增加美國責任的言行，我們相信一定要為白宮的指示所拘束，那是必然的，而且也是當然的。我們對魏特邁將軍可以致崇敬，可以表示欽佩，但實在講不到什麼恩與怨。我們不能希望魏特邁將軍變成駐在中國的麥帥，因為使中國可以有麥帥的祇有中國自己，而不是魏特邁將軍可以憑空效力的。說明白一些，我們祇有自己求進步，而後方可改變她對於國際的貢獻，而後方可博取人家的同情，而後方可要求人家的協助。到那個時候，魏特邁將軍可能就是中國的麥克阿瑟元帥了。自助而後天助，應該是一句不朽的名言。

但是好多的人在那裏不問耕耘但求收穫。這應該是自求幻滅的一般人。當然，我們並不是說魏特邁對於中國無所愛惜，更不是說他這次來華是毫無所謂的遊歷。據最近報紙所披露的，他可能要搜集中共接受蘇聯供應的證據，他可能要調查蘇聯拆走東三省機件的詳情，他可能要研究我們國家經濟的實況，他可能要考察勳員法令的實際效果。亦許這四種目的，都包括在他來華的使命之中。從我們政府的佈置來說，特別希望魏特邁將軍能了解我們經濟的處境，因之準備與魏特邁長談的人，除張羣院長外，尚有俞鴻鈞翁文灝以及張嘉璈三氏。我們似乎認為貸款之所以沒有出手，因為顧維鈞博士還沒有能說的清楚。由各部門主官自己來解剖，亦許是最有效的辦法。在我們的理解之中，始終認為美國並不是不了解我們經濟情形。從抗戰的末期開始，美國是經常與我國保持密切的接觸。我們的生產，我們的消費，以至我們的發行額，在我們雖然不可理解的謎，在他們倒並不缺乏必要的材料。亦許正因為他們過於了解我們的真實情形，所以影響了貸款的決策。我們相信：歷次的經濟上的援助，與其說根據於經濟的理由，還不如說是根據於政治的理由。這個政治的理由現在依舊存在，不過多了一個日本的競爭而已。我們的力量假使能勝過日本，我們就不難得到美國的投資。

根據以上的分析，美蘇之間雖有矛盾，但不到直接衝突的程度。在某種場合之中，兩個國家還會採取途徑以調和他們的矛盾。聯合國是兩國之間的橋樑，英國也是兩國之間的橋樑。但是這個說法，並不是否認美國將

支援反共的國家。中國能適合於某些條件，美國還是願意加以支援的。第一，中國必須把貢款真正用之於復興與建設；第二，中國必須有進步及逐漸強壯的希望；等三，中國應該有政治上的民主。這三個條件，恐怕是魏特邁將軍這次真正要審查的對象。在這三方面能有滿意的答覆，美國的同情才可向我們國家輸送。魏特邁將軍對我們國家的重要在此，而並不在其他。

美國爲什麼要審查這三個條件？理由是很顯然的。第二第二兩個條件就要看看我們國家能否成爲她陣容中有價值的單位。美國固然富有，但是她並不能無條件的施捨一切。杜魯門財政上的決定，完全得向國會負責；而國會的通過杜魯門的建議與否，自然得看這個建議對美國的現在與將來能有什麼意義。中國的錢能用於復興與建設這方面，中國就有逐漸強壯的希望，由是中國在防共方面可以有很大的供獻。不僅如此，貸款如能作合

論愛國

林學洪

• 墓 論 宋 民 •

在今日的世界裏，愛護自己的國家不特是道德上的一個教條，更是法律上當然的義務。但是，這一點並不是從來就是如此的。中國有過一個時代，很長的一個時代，國家只是指一個皇朝的統治集團或組織——包括君主、皇親國戚和大小官吏——一般人民是在國家的範圍之外的。那時的「臣」和「民」有很清楚的界限。「臣子」食君之祿，所以要分君之憂，君辱臣死，假如君主不幸而亡，做臣子的就更無偷生之理。臣子忠君，就是愛國。這個國是一家一姓的國。至於「民」或「百姓」便沒有這種義務，他們惟一的義務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一個朝代亡了，換上了另一個朝代，老百姓照舊完糧納稅，不必尋死覓活，痛不欲生。在道德上他們沒有死護國家的義務。假如他們感念過朝的什麼恩澤，一死以報，他們便被目爲「義民」，所謂「義」就是有點好過了頭，超越了道德上通常的要

求。好像一條狗，小心看守門戶叫做忠，這是作為一條狗分所應盡的，假如牠竟捨命救護主子，就是「義犬」，因為這種行為完全超出了通常人類所貢望於狗的種種。所以忠是忠，義歸義，二者各自有別，自古有忠臣，也有義民，却未見有義臣，也沒有聽說有忠民。沒有義臣是因為在專制時代臣子對於君主和他的國家的義務是絕對無限的，便是以身殉國也不為義；沒有忠民是因為老百姓除了做順民以外，對於君主和他的國家本來沒有什麼一定的義務。

孫中山先生把中國人這種觀念叫做世界主義，他說從前「中國大多數人很提倡世界主義，不講民族主義，無論什麼人來做皇帝，都是歡迎的」。這確是當時實在的情形，戰國以前一般人更沒有為後世所瞭解的那種忠君愛國的觀念。孔子對於亂臣賊子的口誅筆伐總可說不遺餘力，但是他一

面却歷千載。準備覬覦事仇（？），他自己既不以為忤，後世奉他做大臣至聖先師的人也不以為恥。魯國的人可以仕於鄭衛，也不妨仕於陳蔡，「整齊晉用」，也自多見不怪，這是「民」或「百姓」不必一定忠君愛國的明證。

君主專制時代的國家和近代國民全體（‘community’）的觀念完全是兩回事。就是最專制的君主也不厚着臉皮說國家就是國民全體，因為事實上不是的。國家只是君主擴大的財產，所以李淵稱他的兒子李世民謀劃的大勝寶寶是「化家為國」，人民和土地——天下——一向被當做英雄角逐的對象，却不是國家。

近代西方人東來，他們最感驚奇的是中國人愛國心的完全缺乏，其實歐洲人也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具有愛國觀念。在羅馬帝國一統的觀念還深入人心的時候，在教會的組織還沒有分裂以前，西歐的人民除了「天下觀念」（Universalism）以外，無所謂國家觀念，更無所謂愛國心。那時，國家就是王室和宮廷，國家的經費只能就王室收入內想辦法，財政上沒有租稅這一項，國王和貴族要籌款從事戰爭，只有兩種辦法：不是老實不客氣的搶劫，就只有向人民捐募或舉債。各地的人民也都是「無論什麼人來做皇帝，都是歡迎的」。愛國觀念的發生是「民族國家」興起以後的事，歐洲大多數「民族國家」都要到了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後才先後形成，只有英國法國等少數例外，由於特殊的因緣，他們的歷史才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意大利直到十九世紀初年還只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俾斯麥以前的德意志，分成許多小邦，彼此相持如寇隸，只有少數的聖哲才抱着統一的幻想。

什麼叫做「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一羣人民，不分性別、年齡、宗教、經濟利害和社會階級，自覺彼此有共同的命運，結合成一個緊密的集團，對內有休戚與共的關切，對外有同仇敵愾的心理，這就叫做「民族」，一個民族在一個政治主權下統一起來，便是「民族國家」，它不再是帝王一人一姓的家產。却被認為是至大無外（對國民而說）的政治共同體（Body politic）。所以，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實在是同一回事，民族意識強烈，國家觀念發達，就是愛國心熾盛。

民族國家發生的第一個結果是王權無限制的膨脹，所以各國的君主及

其左右更不遺餘力的培養本國人民的愛國心，作種種的宣傳和教化設施，使國內人民相信：國家的存亡榮枯個人民都有一份，人民愛國家，就是愛護人民自己。在另一方面，國界之外沒有法律和安全，一切國家都是天生的仇敵，迫使一般人民感覺站在同一國旗底下的人和國家有同一的命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這樣一來，人民對自己的國家就發生了無限的依賴和愛護的心理，人民對於國家的義務也變成沒有止境的：國家什麼時候認為必要，可以什麼時候要求人民奉獻他們的財產，自由和生命。從前國家不給予人民什麼，所以人民對於國家也就沒有一定的義務，現在國家給予人民生命，給予人民自由，給予人民財產，至少也假裝著是這樣的，所以國家就拿出必要的理由要求人民準備隨時交出國家所給予的一切，甚至交出國家從來不會給予的種種。一句話，忠君愛國已經被認為論理上法律上起碼的要求。

在這裏有一點是十分明白的，人民忠君，是因為忠君正所以愛國。人民為什麼愛國，為什麼應當愛國，那是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國家真正是他們自己的。怎樣的國家才算是人民自己的呢？那就必須經過這個國家裏面人人能够公平地分享生命、自由、財產和種種文明福祉，縱使有時為了時勢的需要，他們不得不作種種犧牲，甚至根本放棄一切人間的幸福，他們也必須獲得充分的保證，他們的每一分犧牲都是爲了保全他們所心愛的人，所心愛的物，和所心愛的一切，而不是徒爲了使少數他們平素所不齒的人得以鋪張，安富尊榮。

正是爲了這種原故，一切民族國家的統治者，爲了要鼓起被治者愛國的熱情，儘管在政治上施行最冷酷的專制，也要極力設法使人民發生「這一切都是爲的我們好」的思想。他們之中少數較得民心的就被稱做「開明專制君主」，就是不肖一些的也不過分的自暴自棄，往往還是裝做人民的主人的神氣。

不過在專制政治的空氣下，種種不平等的罪惡到底動人民對於國家難以發生親切的感覺，於是各國的統治者除了以刑賞激勵人民的服從之外，更採取一種野蠻的手段以鼓動人民的愛國熱忱。他們利用人民盲目的仇外心理和好勝的本能，使他們忘記目前的痛苦和不平，束緊褲帶咬緊牙關，爲一種「聖神的付托」，爲一種征服世界的狂妄思想而流汗，流血。各國

的統治者在國際間散佈惡感。儘可能的使本國人民對一切外國人卑視，疑忌並且憎恨，藉以刺激人民的愛國心理。起初，這種感情是沒有根據的，但是既經深入人心之後，列國對敵的形勢就成了客觀的事實，誰也不能加以挽救。

愛國心是愛護自己的國家，希望她好和一種為她而犧牲的心理，這原是世界上一種極高貴的感情——舍己，為眾衆。在倫理上，我們對於整個人類社會都負有責任，然而在事實上我們却只能對我們所熟悉親近的人盡責。所以，愛國心正如卡爾皮爾孫（Karl Pilsner）所說的乃是「我們一方面承認我們對於全人類所負之義務，而同時又不能完全盡我們的義務」的一種表現。

這是從理論方面來講的，愛國心實際的發生却完全是這一回事，海依士（J. H. Hayes）以為國與國之間發生的種種競爭是起原於各國人民的愛國心，這種競爭不特足以引起各國物質利益的衝突，同時還足以使原來的愛國心變成過分贊揚本國，將世上的一切優點都攬歸本國，並且不許他人評論她的短長的心理。其實呢，海依士這話只說着了一小半，在少數統治多數的世界，如其說過分的愛國心引起對外國的懷恨和排斥，還不如說懷恨外國和排斥外國的心理使得一般人瘋狂的愛自己的國家來得恰切一些。這只要看一看愛國心或民族意識幾乎都是產生於一羣人在歷史上遭受共同的橫逆、驚險和惡運這一點事實便够了。中國人的愛國心是因為英法百年戰爭中法國在本土不斷的吃敗仗才給喚醒的。波蘭人要等到遭了亡國之痛，才來愛國，復國；奧國人的驕縱和橫暴促使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團結一致；德國和西班牙的偉大的民族運動是拿破崙侵略主義的重要結果之一，這和中國的民族運動乃是列強尤其是日本的侵略壓迫賜予的結果完全相似；日本的大和魂也可以說是美國的砲艦給轟擊出來的；巴爾幹半島上的各個民族和他們的愛國心是十世紀的壓迫，虐害和仇殺的產物；俄國共產黨政權的鞏固不能不感謝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國際資本主義的軍事干涉，因為俄國人民反而因此對共產黨的統治權更加擁護，德蘇戰爭無疑又使蘇聯人民的愛國情緒空前昂揚。美國也是這樣，她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民族精神便形高漲。

因為愛國心是這樣發生的，所以就免不了有許多地方顯得不健康。許

多人民因為卑視別人的國家才特別的尊敬自己的國家；因為疑忌別人的國家才特別的信賴自己的國家；因為憎恨別人的國家才特別的愛惜自己的國家。許多人忍受國內的暴政僅僅因為更畏懼外國的侵略。更有許多人除了厭恨別人的國家以外不知道還有愛國的方法。於是國際戰爭就不斷的發生，犧牲了無數的生命，毀滅了無數的財產。每一次的戰爭又都挑起了新仇，增重了舊恨。

野心的統治者濫用人民的愛國心，建立自己的帝國。人民愛國的熱心使許多帝國強盛了，煊赫了，但是這些帝國和他們有什麼相干呢？他們是建築帝國的磚石，淌的汗最鹹，流的血最熱，但是沒有等得及他們死去，世界就已經把他們遺忘了。

在專制獨裁的統治下，終久有人要覺悟他們一向愛着的不像是他們自己的國家，不然為什麼他們的生命缺乏保障，財產常受剝奪，自由也不斷的受蹂躪？他們經常的繳納租稅，對於這些錢財投放在何種用途却一點也不能控制；毀法者往往就是立法者，枉法者也常常是執法者，特權階級的跋扈極使一般人民感到痛苦；尤其難堪的是，每隔一些時候他們就要橫受戰爭禍害的煎熬。

於是乎許多人站出來要求開放政權，甚至推翻了專制政體，建立起議會政府，這就是偉大的民主運動。民主的新哲學是「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人民運用民權直接控制議會，間接控制政府，這個政府是民有的，民享的，也是民治的。民主政治的精神和原則使許多人民感覺他們真正有一個國家，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人民愛國的熱情重新被鼓起，無比的熾烈。民主國家的人民熱愛他們的國家，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國家屬於他們自己；他們這樣感覺，不只因為國家給予他們種種幸福的諾言，更其重要的是因為他們自信對於這個國家的命運，因而自己的命運，多少可以控制。

民主革命，在許多國家裏還不是全民的解放。只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在民主政治的溫柔中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迅速的發展。結果，少數的富豪掌握了全國的經濟命脈，貧富的懸隔日甚一日，權力的集中也一天厲害似一天。資本主義的社會患了根本的病痛，正像魯意喬治說的那樣，「因為豐富，反而造成了稀少」。這迫使人們再一次的懷疑他們狂熱地愛着的國家是否真正屬於他們自己。他們有生命，只是這個生命是最富足的國度裏

最貧窮的生命；法律給他們的自由以種種保障，然而在事實上他們還是一羣奴隸，不過沒有鎖鑰匙了；他們也不用爲自己的財產安全擔憂，因爲除了一副臭皮囊之外他們再沒有真正可以叫做財產的東西。最不幸的是每二十年或十年他們就要被迫參加一次極端慘酷的現代戰爭，因爲戰爭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病症。這種戰爭，由國際侵略主義者挑動的他們固然不能事先加以制止，就是由本國的好戰分子製造出來的，他們也不由自主。國家諸許於人民的是這麼多，實際拿出來的又這麼少，有一天危急的時機到了，却奪去了一切。但是少數的經濟貴族在平時固然生財有道，到了戰時，他們也照例大發橫財，這樣的國家應當怎樣愛法，確使許多人感到惶惑。

英國的斯特萊徹（John Strachey）先生在他的近著「Socialism Looks Forward」告中警英國的勞動階級愛國要是胡亂的愛就要上當，要愛國先得弄到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他的一段話說得十分警闢，值得反覆尋味：

在某一種意義上，幾乎我們（按指英國人，下同）全體都和我們的國家利害相關，這是的確的。我們只要活得了，不管怎樣一個活法，就算從我們在不列顛建立起來的這種有組織而且文明的生活方式裏面領受到莫大的恩惠。爲了這一個原故，我們都覺得這是我們的國家，這個國家我們必須，並且願意，加以保衛；在某一種意義上，這樣的感覺也是對的。

「這一切引向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喚起人民的愛國心，號召人民獻身祖國，號召人民爲國犧牲是高尚而且尊貴的；但是這種號召也可以被人極可恥地濫用。既然這樣，當有人向我們作這種號召時，我們那兒可以不特別小心在意我們不是在受人欺弄，我們那兒可以不

特別留神他們要我們爲之犧牲身家性命的真正是我們的國家，而不是羅塞米爾爵士（Lord Rothiemere）的或者俾維布魯克爵士（Lord Beaverbrook）的國家？

「在今日這種世界之中，一個人起而爲祖國而戰，誰也不能否認有時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四千三百萬勞動者一天不能使我們佈滿在這個國土上的田畝、礦坑、機器、船塢、鐵路、工廠和其他種種都屬於

最貧窮的生命；法律給他們的自由以種種保障，然而在事實上他們還是一羣奴隸，不過沒有鎖鑰匙了；他們也不用爲自己的財產安全擔憂，因爲除了一副臭皮囊之外他們再沒有真正可以叫做財產的東西。最不幸的是每二

十年或十年他們就要被迫參加一次極端慘酷的現代戰爭，因爲戰爭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病症。這種戰爭，由國際侵略主義者挑動的他們固然不能事先加以制止，就是由本國的好戰分子製造出來的，他們也不由自主。國家諸許於人民的是這麼多，實際拿出來的又這麼少，有一天危急的時機到了，却奪去了一切。但是少數的經濟貴族在平時固然生財有道，到了戰時，他們也照例大發橫財，這樣的國家應當怎樣愛法，確使許多人感到惶惑。

英國的斯特萊徹（John Strachey）先生在他的近著「Socialism Looks Forward」告中警英國的勞動階級愛國要是胡亂的愛就要上當，要愛國先得弄到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他的一段話說得十分警闢，值得反覆尋味：

在某一種意義上，幾乎我們（按指英國人，下同）全體都和我們的國家利害相關，這是的確的。我們只要活得了，不管怎樣一個活法，就算從我們在不列顛建立起來的這種有組織而且文明的生活方式裏面領受到莫大的恩惠。爲了這一個原故，我們都覺得這是我們的國家，這個國家我們必須，並且願意，加以保衛；在某一種意義上，這樣的感覺也是對的。

幾千年來，中國人沒有國家觀念，只有家族觀念。家族不特是每一個中國人物質生活所依賴，同時也是他們精神生活唯一的寄託。家族對於它的成員負有無限關切的責任，各個成員對他的家族也因而發生了無窮的愛，無窮的義務。在茫茫人海之中，惟有從這裏他們才找到生命的安全，感情的溫暖和靈魂的歸宿。一個人離開了家庭，離開了鄉黨戚舊，就要憑着自己的一點聰明本領，爲着生活作最無情的奮鬥。一旦有了什麼殘念，遇到什麼危難，願意伸出同情的手，加以接濟救助的還只是自己的家人親族。真的，在這樣的世界上，除了自己的親人，能够「解衣衣我」的有幾人？「推食食我」的又有幾人？所以，在舊日的社會裏，家族觀念那樣的根深蒂固，不是沒有緣由的。一般人但知有家，不知有國，也不全是因爲他們目光短淺見不及遠的緣故。觀念源於實際生活，又適應着實際生活。要把家族觀念擴大爲國家觀念，使一般人移所以愛於家族者愛國家，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就必須澈底的改組國家生活，不是空言喚起民衆就成功的。

國家能不能保證人民的物質生活？能不能調護人民的精神生活？如其不能，便要設法做到，因爲否則人民還是重家族，輕國家。利用刑獄、警察和軍事組織，國家自然可以任意驅策人民，但是這樣就談不上愛國心。愛國心是一種感動，不是威脅出來的，更不是鞭打出來的。在強力的統治下，人沒有眞純的愛國心，只有消極的順從，無實的憤怒和陰沉的不安。

不錯，一切的國家都是無數的個人組織成功的，對於國家每一個人民

我們，就一天沒有一個真正或完全意義的國家，可以爲之犧牲性命。因爲假使我們不當心，我們被要求來爲之犧牲的，可以不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却僅僅是爲了現行經濟制度的存續」。

理論上都有一分力量以或種方式影響它。例如，假如一般人民沒有愛國心，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國家就永遠興盛不了。但是舊式的國家組織都傾向於使少數的人成為統治者，多數人成為被統治者，前者掌握國家的命運，利用國家的名義行使一切權利，後者不過是一羣供驅策受剝削的奴隸。統治者常常以自身的利益為國家的利益，因為他們有解釋國家的利益是這樣不是那樣的「合法權利」。結果，人民擁護國家實際變成擁護這種既得利益，所謂國家實際只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的別名。雖然國家的一切行動照例都要借用國民全體的名義，所謂全民的國家實際不過厚顏的欺騙。

在這種情形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有時弄到同國際的矛盾一樣的深淵，一樣的不可救藥，甚至更甚，不特一點不希奇，而且也是自然而然的事。為什麼？因為少數、統治着多數人，換句話說，因為沒有民主的緣故。

「為國犧牲，最光榮而甜蜜」，羅馬詩人荷雷士（Horace）曾經這樣歌頌。假如這個國家不是自己的，平白的為牠犧牲，那可是喝一杯苦酒。所以，問題不在人民愛國不愛，而在怎樣的國家才算真正是人民自己的，怎樣的一個愛法才會愛到人民自己的國家。

從來社會主義者都被認為是「不愛國的」，特別是在那一班自己的腰包將因任何革新而損創的人眼裏看來，社會主義者更是一種要不得的危險分子。其實社會主義才真正是愛國主義，不過它愛的不是少數特權階級的國家，而是真正國民全體的國家罷了。孫中山先生說他的主義是打抱不平的義，社會主義要打破國內的不平，也要打破國際的不平，但是它把前者看得更為迫切，更為重要。

為什麼更為迫切，更為重要？還有兩層理由：

第一，國內社會的不平較之國際社會的不平更難容忍，更不可容忍。當我們遇到緊急危難的時候，許多路人坐視不救，我們心裏或者不免生怨望，但是假如坐視不救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兄弟，那麼我們心裏就不止怨望，而且要憤怒了。這說明什麼？我們對於路人本來愛之薄，甚或無甚感情，所以實望之心就淺；我們對於自己的兄弟愛之之心深，所以實望之心也深切，惟其實望之心切，受了冷遇，便覺怒不可遏。同樣的，暴

徒欺凌甚至威脅我們，使我們憤恨，假如這個暴徒是我們的親人之一，那麼憤恨之中一定交織着痛苦的感情，這種苦痛過了一個限度便只有加深了憤恨的程度。

惟其愛之深，所以一旦受欺，憤恨怨毒之情也就如堤防，勢不可止。恨以愛的範圍為範圍，也以愛的程度為程度，這是一切道德的第一條原理，也是第一條原則。所以異邦人的侵擾迫害激起我們的憤恨，本國人的侵擾迫害所激起的是十倍百倍的悲憤和疾恨。國內的不平，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或是社會的，都沒有什麼理由比之國際社會的不平更應當受容忍。相反的只前者更難容忍，更不可容忍。

其次，國內社會一天沒有公平，國際社會的不公平也一天不會存在。國內的不平所以然常受容忍，完全是因為各國的統治者都很巧妙的把這種不平等制度建築在國際的不平之上。國內不安的情勢可以因為國際的激動而多少趨於緩和，但是世界因此必須付出極重大的代價，一種不平等常常利用更多的不平等來維持平衡，這種平衡是極不穩定的，一旦破壞了，就必須依賴一次比一次殘酷的戰爭來恢復。

國家不是無始，更非無終，既不天然的神聖，也不天然的尊嚴。民族和國家永遠是不完全的東西，我們愛國家不單單因為我們由於一個不可知的機緣降生在這一塊土地之上，而是因為牠是可愛的；國家要怎樣才是可愛的？那就必須在這個國家裏面人人能够分享文明國家的人民應享的種種幸福，人人能够過着公平的，合乎正義的生活，至少也要有這種希望，並且這種希望不過分的渺遠。因為假如人民在國家裏面不能過着公平的，合乎正義的生活，又沒有這樣的希望，說他們還有一個國家，實在沒有意義，如果再要主張他們必須無條件的愛這樣的國家，並且照統治者指定的方法愛，那更是忍心害理。所以凡是足以保證公平而又合乎正義的國家生活，做國民的人都當，並且也都有權，要求其實現，促其實現。要做到這一步，諾言和仁慈自然不够，還要人民有充分的實力和權力，達到政治的自由和經濟的平等，使前者完成後者，後者充實前者。我們說孫中山先生的救國理論最透澈也最正確，因為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是以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為條件去解決民族問題，同時對於民生和民權問題也一併進行解決。却不是搬出一個走樣的愛國主義來敷衍民權問題，來敷民生問題。

杭州通訊社報紙通訊社透視

• 天 胡 •

這裏的報紙，以篇幅來說，既有對開的大型報，也有一開甚至於八開的小型報，自然而然免不了有大吃小的情形；譬如對開的東南日報，工商報，大同日報，正報，就看不起四開的天行報，民報，當代報；八開的西湖夜報，民聲晚刊，當然更不在大報的眼中。而同樣的對開報也因了資金，歷史，銷數互有上落的關係，東南瞧不起工商，工商瞧不起大同，大同也瞧不起正報，都有唯我獨尊的「老大」心理，所以達到配白報紙等有利的場合，終於發生了操縱之類的情事，結果當然小報吃虧，以致於借高利貸，吃黑市貨，說起來是不很公平的。

正，所以惟有衆多的通訊員，和若干地區的專電及交換電，而這決非固執成見或門戶之見甚深的頑固派的報紙所能辦到的。新聞的編輯方針如是，其言論自然更公式化了的，難得有一二篇的老百姓講話的文章，那是爲了攻擊內定的政府要員而借題發揮的。不過，有一個可喜的現象是，除了正報，當代報外，各報都劃出半版或四分之一的篇幅，有每日，隔日，半週一次的社會服務版，來容納讀者呼聲，知識講座，人事介紹，醫藥法律問答，等類稿件，美中不足的是編者亦不能比較客觀的儘量刊載讀者來稿，尤其是呼籲之類的大小文件。

版面零亂，字裏行間，也錯訛百出，更有趣味的，一條新聞，各報社頗多願意重載，雖然相隔時日不久，原來作短行刊載的新聞，越日復以三長地位強調它的重要，如果讀者中有剪貼僻好的，極容易發覺此類不算希罕的妙事，連續在杭州幾張大報中發見。

一、報紙部份

杭州大小報紙，現有八家之多，論形式，有對開，四開，八開之分，論內容，有統一的官方新聞，有奇怪發達的社會新聞，更有十分色情的內幕新聞，五光十色，煞是熱鬧。

至於各報內容，新聞方面，差不多完全是官方的報導，言論方面，尙不能達到自由的境地。東南，大同，正報，民報，當代報的立場，因為

以讀到上海出版的大公報，新夜報等，於是各報差不多都訂閱了，作為編排上的藍本，有的報紙竟一字不易的剪下轉載，而冠以，「本報某日某地電」，當作消息的唯一來源。這種偷懶取巧的方法，正被普遍的應用着，也許，報社當局不士

歷史最舊，不過，當代報是以晚刊姿態問世的。內容均平平，編排印刷，天行報略勝一籌。前面已經說過，民報，當代報都是十足的國民黨系報紙，尤其是民報，它以屬共產黨著名，天行報態度，似找機會發洩，有時極左，有時甚右，好像左右不逢源，其實是缺乏堅定的立場和主張，這原因是轉載的文稿太多太隨便，有一次因轉載文匯報的「張學良會恢復自由嗎？」一文竟被當局處公停刊七天。可是，天行報當局的堅苦精神，則是值得佩服的，它終究是一張民營報紙。

八開的西湖夜報，民聲晚刊，簡直是上海黃色小報的翻版，專載歌女私生活等等消息，了無新聞價值可言，而且時常鬧休刊復刊的玩意兒，主持人毫無辦報素養，連普通的新聞眼也未具備。

各報銷數，以東南佔第一位，日銷約一萬五千份左右，工商次之，日銷約八九千份，其他大同，正報，天行，當代各報銷數，自千份至五千份不等，經濟情況，均不甚佳，除東南一家外，都月月虧蝕，工作人員待遇，也極菲薄，最少的只能維持個人伙食而已。

二、通訊社部份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通訊社的情形。論數量，杭州通訊社之多，不但冠于全省各地，據中宣部的統計，也比任何省市發達，總計當在四十家以上，然而正式發稿的只有二分之一，按日發稿的更不多見，其中以官方辦的中央社杭分社，和省黨部辦的國民社，隸由國防部新聞局管轄的

軍聞社，稍具規模，任用有固定的外勤記者一二十人不等，祇是所發佈的全是官方法令，要員言行之類的新聞，故深為報紙編者所樂用。民營通訊社中，以超黨派的後起之秀新生社最為活躍，該社發稿不過一個半月，因首先發佈甯紹南沙陸沉的詳盡新聞報導，而獲致同業，政府當局暨人民的一致重視，在前項新聞中，該社不特嚴正地指出南沙保塲工程處的空洞無用，抑且提供當局以搶救之策，新生社，便如此地奠定了不拔的發展基礎，在人民心目中樹立起可貴的信仰。現在，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新生社是為人民大眾呼籲的了。

在杭州通訊社中，闢有資料室的，除了官方的中央社杭分社外，民營的只有新生社一家，該社有中西文圖書，報章，新聞參考資料達數百種之多，蒐藏上是頗稱豐富的。

總之，杭州新聞界的現狀，仍停留在民國廿四年間的保守階段，記得當時，我曾為上海立報寫過一篇通訊，敘述杭州新聞業的發展情形說：「杭州報界還被羈留在故步自封的領域裏而未擗出一條光明的大道來」，現在，這句話似乎還能够適用。

訂戶，在收入上說，幾乎已能自給自足了，但這只有中央社一家能做到。

不過，若干通訊社，因不怕出醜，甘冒著極大的危險——誹謗有錢無勢的商人為漢奸，共匪，却也弄着一些冤孽錢，生活過得逍遙自在，但這又是不應有的例外。

大 華 貿 易 行

經營國內外進出口業務

地址：南川路四號

電話：七八九一〇

分 公 司

香港 天津 島青

國內電報號：〇五六一

國際電報號：WANU TSUAN

徵稿簡約

一、本刊稿件除請專家特約撰述外，並歡迎外界投稿。舉凡

經濟政治問題之探討，專題之研究介紹，翻譯及文藝通

訊等作品，均所歡迎。

二、來稿字數請勿超過五千字，其有特殊價值者，不在此限

•

三、來稿請用語體文或通俗文言，用有格稿紙寫清楚，並

加標點。

四、譯稿須附寄原文或註明出處。

五、筆名由作者自擇，惟稿未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

六、凡經本刊登載之稿件，非經允許，不得另在他處發表。

七、本刊編者對全部稿件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

明。

八、來稿如不需用時，概不退還，其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九、來稿一經刊載，當比照一般稿費標準，從優致酬。

十、來稿請寄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本社。

民主論壇週刊 第十一卷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版

本期實價每冊三千元

編輯及發行者

民主論壇社
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

上海經售處

聯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二一五號

人文書報社

上海：外灘A七號內三〇三號

南京總經售處

中外書局
太平路八一號之一

印 刷 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三三七弄九〇號
電話：三七三五〇

行銀誠興聚

人羣便利社會服務

務業切一行銀業商營經
匯外營經定指家國由並

史歷年餘卅有

點地匯通▶

貴陽 昆明 宜昌 宜沙 漢口 天津 北平 香港 廣州 南京 上海
自流井 內江 遂寧 瀘縣 峨眉山 宜賓 萬縣 重慶 成都 常德 長沙

義豐錢莊

營業項目

七六五四三二一

存放匯貼代理收

押代理收
其他商業
一切業務
款務銀商

上海分莊：
地址：南波路二三三號
電話：九三四三三號
電報掛號：二二三三號

重慶總莊：
地址：陝西路二三八號
電話：四一二五二號
電報掛號：四四一六號

信用鞏固 利息優厚
款兌現款交匯

上海分莊：

中裕企業有限公司

專營進出口業務

件機器供應——廠器機：附設
粉製機供應——廠粉機

址地川南一路三號

電話 87802 號電

號六十四大豐美慶電

號七卅百一路正中津天

Chung yu Shanghai 或 0195 號掛報電

香港 約紐 司公分外國

印度 敦倫 表代外國

建業銀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二〇一號
電報掛號 九七一五〇九二七七四
電話 九二八二二九四五九三
總管理處 上海東體育會路模範村二一號
電報掛號 七三八七五七
重慶分行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成都分行 成都湖廣館街四八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長沙分行 長沙中正路一四號
電報掛號 一〇八三
電報掛號 七二三〇